

Occasional Paper No. 166

March 2006

港深合作發展 尋求前瞻性的思維

楊汝萬編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公共政策論壇報告

港深合作發展
尋求前瞻性的思維

楊汝萬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編者簡介

楊汝萬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講座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及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

鳴謝

本論壇之籌備及本報告之完成，有賴紀緯紋先生之努力與貢獻，編者謹此深表謝意。

© 楊汝萬 2006

ISBN-10: 962-441-166-2

ISBN-13: 978-962-441-166-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港深合作發展

尋求前瞻性的思維

前言

(楊汝萬)

香港和深圳兩地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高速發展，現已成為全球和中國的重要經濟城市。其實，香港與深圳只是一河相隔，發展本來各有千秋。深圳在工業、旅遊、物流、金融和創新企業等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深圳的競爭力和人均收入在全國名列前茅已是不爭的事實。反過來，香港經歷了八年多一國兩制的考驗，在過渡初期因為有內部的和區域外的種種原因，使它的經濟下滑，管治混亂。但是，在過去的一兩年，情況明顯好轉，現在香港出現近乎一致的共識，就是會有美好的將來。此外，香港迪士尼樂園在2005年9月正式開幕，標誌著旅遊業以至整個香港發展的新里程。

香港與深圳在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從民生、跨境建設，到政策上的合作與日俱增，合作力度愈見強大。前瞻未來香港與深圳的關係，兩地人士各有見解，建議之多可謂百家爭鳴。因此，在2005年9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和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共同召開「港深合作發展前瞻論壇」，並邀得香港和深圳七位講者為兩地未來合作發展共謀對策。講者包括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查振祥博士和深圳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魏達志博士，他們兩位就港深的金融合作方式和共同市場發表意見；香港大學城

市規劃與環境管理中心葉嘉安教授，從專業角度分析過去、現在和未來港深兩地的城市規劃；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張贊賢教授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王一萱博士，分別論述兩地政府面對的挑戰和證券市場的合作政策；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鄭振耀教授和卓識公司陳豫川先生，他們分別從公營和私營角度探討兩地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發展。

此外，為了解香港市民對港深兩地合作的意見，香港亞太研究所在論壇舉辦前數星期以電話方式進行了「香港市民對香港和深圳兩地發展前景意見調查」，並於同日論壇上公布調查結果。

電話調查結果

（楊汝萬）

今天的論壇有兩部分，首先是一個新聞發布會。我們於2005年8月進行了一個電話調查，旨在了解香港市民對於港深合作的看法，在開始這個部分之前，請允許我介紹今天論壇的背景。選擇這個時候舉辦港深論壇十分適宜，因為在過去的幾天中，國家副總理曾慶紅來到香港為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時，提出了港深合作的重要性。稍後，溫家寶總理在深圳也提出了深圳的定位和與香港的關係。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舉辦港深論壇可謂最適宜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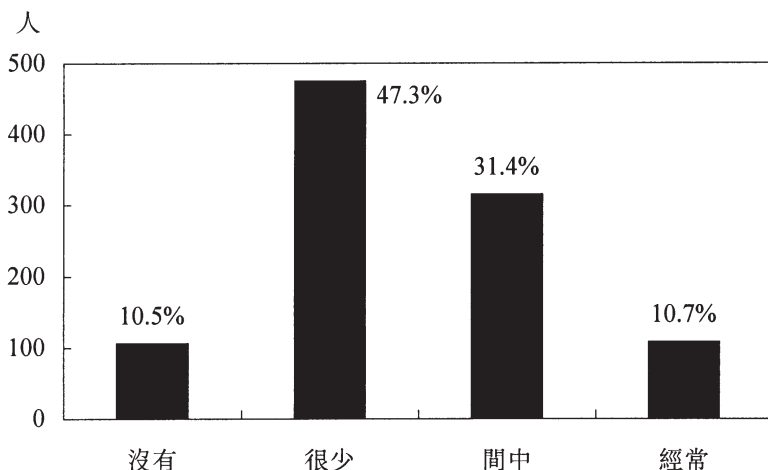
對於香港和深圳的關係，我們一直會撫心自問，是合作還是競爭？我個人相信兩者兼而有之。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要講求合作，也要面對挑戰，當中孕育無限商機。我們在這個時候很需要嚴肅的提出和討論以下問題：香港和深圳如何合作才能適合兩地的發展？可以說，這個問題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了很久。我相信今天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有這麼多專家和學者在場，一起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香港、深圳的相互影響和無形

的融合，在25年前伴隨著深圳特區的成立而開始，港深口岸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最繁忙的口岸之一，每日人流量達到20至30萬人之多，那麼到底香港人對於深圳的認識如何？他們對於港深合作的憧憬和個人體驗又是如何呢？對此，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05年8月進行了一個富有創意的問卷調查。這個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簡介如下。

電話調查的對象是18歲以上，能夠用廣東話或普通話溝通的香港市民。通過隨機抽樣，總共成功的和1,005位受訪者完成了這個有26條問題的調查（見附錄）。較重要的問題包括：

一、「請問你有幾經常到深圳呢？」有57.8%即近六成人表示沒有或很少去深圳，這數字不足為奇。香港大約有700萬人口，近六成人很少去，另外四成人是間中或者經常到深圳，其中經常到的人有10.7%，換言之有70萬人之多。70萬人經常去深圳，數目絕對不小（圖一）。

圖一：到深圳的頻率（%）



(N=1005)

二、「你到深圳的主要目的是甚麼？」（答案可選多項）大多數人跨界去深圳的目的與我們了解相符。56.6%的受訪者表示是購物和娛樂。羅湖商業城，老街等地方都是吸引香港人的場所。探親的有18.5%，這也不少，表示很多香港人在深圳有朋友和親戚可以探訪。工作反而偏低，只有11.6%的人表示去深圳是與工作有關（圖二）。

三、「你最留意深圳哪方面的事務呢？」（答案可選多項）這是一條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受訪者對深圳哪些問題最為關心和關注。一枝獨秀，大家最關心的是治安。通過香港的媒體報道，我們了解香港人到了深圳，不時都會遇到各項有關治安的問題，包括打劫、桃色事件和陷阱等。其他的問題如旅遊事務和娛樂，在我們這次調查中沒有詳細涉及和跟進。其他關於經濟發展和交通的事務都是很重要的（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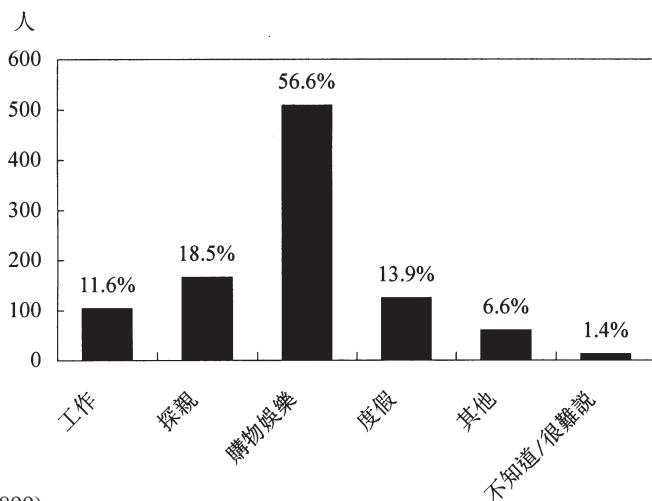
四、「你本身有沒有需要到深圳工作呢？」根據之前的一個問題，只有11.6%的受訪者到深圳是和工作有關的，在如此背景之下，90%的受訪者表示去深圳和工作無關，也就不足為奇。

五、「你或者你家人有沒有在深圳擁有住宅物業呢？」這個和之前的一個問題也相關，回答是極大多數（89.9%）的受訪者表示沒有物業在深圳。

六、「你有沒有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呢？」通過這個問題，我們嘗試了解受訪者雖然目前沒有在深圳居住，但是否考慮過要在深圳長期生活？大多數（94.7%）的受訪者表示沒有考慮過，只有5.3%的受訪者有考慮（圖四）。以此推算到香港總人口，就是說有35萬香港人有到深圳長期生活的考慮，這些人自然要解決在深圳居住的問題，甚至會在深圳買房子。雖然百分比數目偏低，但反過來看，要提供30多萬的樓宇，數目也是不小。

七、「你不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的原因是甚麼？」（答案可選多項）最主要的回答是香港人滿意居住在香港，香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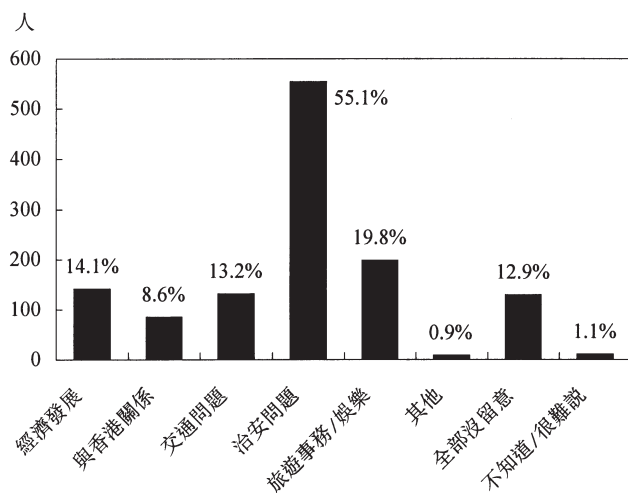
圖二：到深圳的目的 (%)



(N=899)

注：只問曾到深圳的受訪者；答案可選多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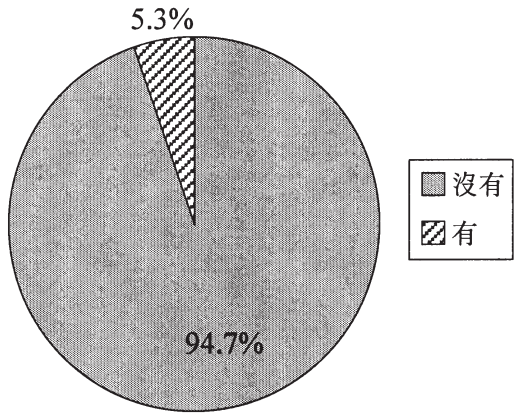
圖三：最留意的深圳事務 (%)



(N=1005)

注：答案可選多項。

圖四：有沒有考慮在深圳長期生活（%）



(N=1005)

生活模式讓人嚮往，所以一半以上（55.9%）的人都是滿意或者已習慣香港的生活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香港的電視、魚蛋粉、雲吞麵等，這些都是很特別的生活因素。基於這些原因，香港人表示不會去深圳居住。同時也有相當大比重（46.4%）的受訪者擔憂深圳的治安，這些事件在香港媒體常有報導。其他還有醫療和衛生情況不是很理想（26.3%）（表一），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安全網。在香港，有甚麼事情發生了可以打電話999，幾分鐘就有回應了。到了內地，不單是深圳，其他城市也一樣，沒有相同的保障。

如果在深圳能夠建立一個擁有香港生活模式的社區，有香港的醫生和醫療系統可以提供保障，受訪者是否會被吸引到深圳居住呢？這裏頭有很多假設，情況會與現時的不一樣，於是有些差不多四成（39.8%）的受訪者表示會考慮去深圳居住。但是，亦有一半以上（53.6%）的受訪者表示不作考慮，他們還是認為香港好，覺得深圳不是很吸引。

表一：不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的原因

原因	頻數	百分比
滿意香港的生活/已習慣香港生活	532	55.9
當地治安差	442	46.4
醫療保障/當地衛生情況差	250	26.3
家人意願/家人不支持	111	11.7
生果金問題	32	3.4
其他	75	7.8
不知道/無所謂	19	2.0
總計	1461	153.5

注：有效樣本為952人；答案可選多項。

八、最近，一些討論關注邊境河套區的發展，幾年前推出2030香港長遠規劃諮詢時，也提出過河套區的土地使用問題。在河套區發展跨境工業園以及物流集散地，是否對香港有益處呢？最近情況有所變化，於是有新的討論。有多過一半（57.1%）的受訪者相信會對香港經濟有幫助（表二）。這問題可以在之後詳細討論。

九、我們也問受訪者港深兩地在未來應該加強哪方面的合作？這從我剛才介紹的調查結果可以想像，受訪者大多關注治安問題，54.6%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在這方面下多點功夫，兩地加強合作。其他方面就不見得顯著，例如說經濟合作、融合的有40.6%，人流、物流和資金流互動的有30.3%，交通基建的有29.5%，文化交流的有25.7%，分布比較平均（表三）。

十、「港深進一步合作發展或融合對香港有否影響？如有，是正面或負面？」多數受訪者都持正面態度，佔53%；持負面態度的只有16.8%。大家都想不到兩地政府、人民合作，

表二：在河套區發展跨境工業園和物流集散地對香港是否有益

	頻數	百分比
會	573	57.1
不會	228	22.7
不知道/很難說	202	20.1
總計	1003	100.0

表三：港深兩地在未來應該加強合作的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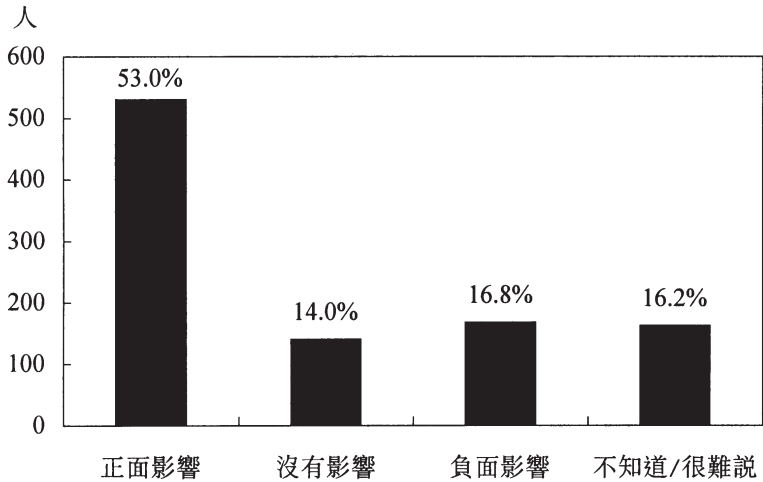
合作項目	頻數	百分比
治安問題	548	54.6
經濟合作/融合	407	40.6
人流/物流/資金流	304	30.3
交通基建	296	29.5
文化交流	258	25.7
其他	10	1.0
沒有需要加強	7	0.7
不知道/很難說	55	5.5
總計	1885	187.9

注：有效樣本為1003人；答案可選多項。

怎麼會有負面的影響，所以自然地持負面態度的比例是比較低（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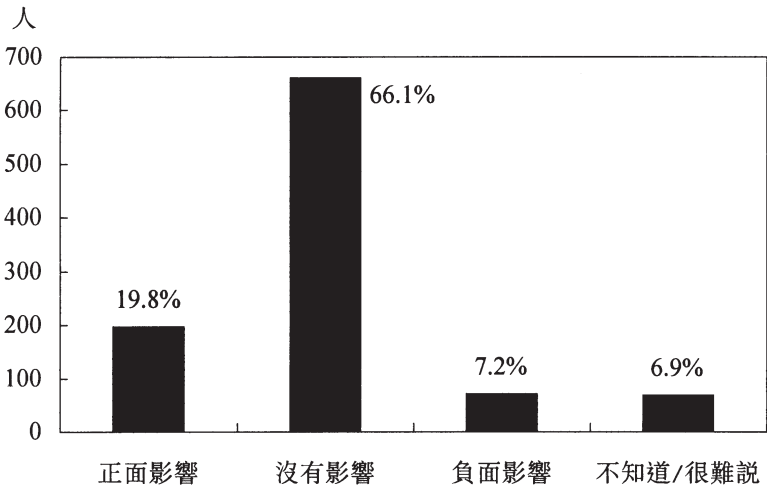
十一、「港深進一步合作發展或融合對你有否影響？如有，是正面或負面？」覺得沒有甚麼影響的達66.1%（圖六）。這顯示出從宏觀和個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結果很不一樣，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可以看到兩地進一步的合作和融合對兩地的政府都很好。但是對於個人，我相信，可能需要多一些時間才能看到影響。

圖五：港深進一步合作發展或融合對香港的影響（%）



(N=1001)

圖六：港深進一步合作發展或融合對受訪者的影響（%）



(N=1000)

十二、「你認為港深未來的發展方向應朝哪方面發展呢？」（表四）我們清楚看到，68.5%的受訪者認為應該更加緊密合作，合作對兩地都有好處，合作的結果會使兩地市民都得益。

我在這裏已經很簡單地介紹了我們的調查結果。我們馬上要進入的第二個部分，也就是我們的論壇。現在不如先讓記者和其他朋友對我們的調查結果進行提問。

記者提問：調查結論指出港深兩地要加強合作，那麼香港政府和深圳市政府應擔當怎樣的角色？港深兩地政府的合作範疇在哪些方面需要有所加強呢？

據我了解，過去一段時間，特別是香港回歸之前，在深圳就有很多有關港深合作的討論，提出了很多模式，例如「一城兩市」，很多深圳學者、書籍都對這些合作前景有很豐富的見解。反過來，香港就比較少面對這個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回歸前，我們還沒有達成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甚麼樣的制度？對我們原來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產生甚麼樣的變化？當時還是一片空白。所以在九七之前，深圳的朋友會憧憬香港會和深圳多些融合，可以說，深圳的學者在當時就有很多看法，也

表四：港深未來合作的發展方向

	頻數	百分比
更緊密的合作發展	684	68.5
維持現狀	129	12.9
各自發展互不相干	116	11.6
不知道/很難說	69	6.9
總計	998	100.0

有很多書籍出版。但是有鑒於一國兩制的敏感性，我相信這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於是討論就出現一面倒的情況，出現深圳熱香港冷，香港很久都沒有學者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角色的問題，我想首先要看兩個政府的看法。

我在開場白中說，中央政府的總理和副總理在過去的一個星期都提出了港深合作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深圳經過25年的發展，定位已經和設立之時有很大分別，那麼深圳的定位是甚麼呢？特區作用的問題並不是今天才提出的，過去十年就一直討論，改革開放的局面已經是全方位的了，深圳在政策上完全沒有比較優勢，最初向特區提供的一套政策，現在很多地方都享有了。遠至新疆等很偏遠的西北邊疆，都有近乎開放政策的實施，所以我相信深圳需要有新的動力。動力如果來自中央領袖，好像過去幾天我們所聽到的，我相信是很好的動力。有這個動力，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至少開始對這個問題能夠有較為嚴肅的討論。我這樣回答可能還沒有完全回應你的提問，但是至少今天論壇的作用也是希望喚起一些專業人士、政府、一般市民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考慮，對香港和深圳在廿一世紀的長遠發展，作出更好的思考。如果在一國兩制框架之下，我們解決了這個敏感的問題，前景是很寬闊的，甚麼都可以想像。

記者提問：調查結果顯示68.5%的人認為港深兩地應該更加緊密合作；但另一方面，數據亦顯示香港人對深圳的接受程度並不是很高，有一種比較抗拒的感覺。比如治安、長期居留，都很難接受。在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下，香港人本身的抗拒感會否成為障礙？

這個抗拒感，說明了一個現實，就是香港生活模式對個人而言很重要，所以香港人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生活模式。但是我們多加一些假設，譬如假設具有香港生活模式的社區在深圳可以出現，醫療和相關保障可以加強，滿足了這些假設之後，市民對於深圳的接受程度就可以大大提高了。換句話說，情況有

所改變，市民的接受程度也會相應提高。在這方面，我們應抱開放的態度，明白到香港人很珍惜香港的生活模式、自由度、吃喝文化、多元化，這是香港很有特色的文化和品味，如果這些能夠在深圳出現的話，那麼抗拒感就會大大減低。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治安問題，你也看到治安問題在整個調查中是非常突出的。

記者提問：調查反映出53%的受訪者同意港深進一步合作對香港有正面的影響，但是為甚麼從個人來講，港深合作還是不能影響到個人？

就這個問題，我有一個揣測。受訪者看到的這些轉變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的合作，這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到了個人的層次，就隔了一層，所以需要時間觀察一下，看看情況是否有轉變，而且是向好的方向轉變。正如我指出的，特別是在調查顯示的，治安、醫療，以及有關的社會支持措施都很重要。這就是為甚麼市民對大局有很樂觀的看法，但是到了個人層次，就要先看實際情況對個人感受是否有利，有一個跳躍、一個距離在當中，這就是我的解釋。

我們進入議程的下一部分，主要是對港深合作發展作出前瞻。我們在座有七位學者、官員，他們會從規劃、經濟、政策、教育等不同的方面討論這個問題，其中四位是深圳的學者，三位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

港深金融合作方式需要進行創新

（查振祥）

今天這個論壇時機選擇得非常好，溫家寶總理考察深圳以後，我們就進行這個論壇。溫總理在考察深圳的時候，特別強調要加強港深合作，實際上這已經是個老話題，只是每一次的

討論都帶來一定的深化。現在，我覺得最好能夠提出一些實質性問題，特別是有建設性的建議和對策，這樣我們才能把港深合作推向深入。我覺得目前港深合作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港深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能不能進一步作深層次的合作。為甚麼呢？因為港深合作應各自發揮優勢，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非常強大的融資能力和資本運營能力，是國際資本市場的一部分；深圳是國內一個區域性的金融中心，它的金融實力在國內也算是很厲害。

香港應推使兩邊的金融力量加強合作，並且向國內延伸。這方面如果能夠成功，那麼港深合作就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對於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也對國內的經濟發展，起到帶頭和龍頭的作用。儘管香港現在的資本市場也在不斷加大在國內選擇公司的上市力度，但是還很有限。我在2003年提出了「一版兩市」的主張，即一個公司可以在深圳、香港兩個證券市場上市和交易，進行深層次聯合。這個理論在國內外很受關注，儘管到目前還沒有實施，但是這兩年來，理論界對這個主張還是很感興趣，兩地的證券界也一直在作相關探索。當然「一版兩市」受到體制的局限，實施起來可能有很多困難。

我今天想繼續談談我對下一步港深合作的看法。為了實施港深證券市場合作，我認為可以考慮在港深兩個證券市場之間建立一個「窗口交易合作體制」，這是借鑒新加坡和澳洲證券交易所的經驗。他們建立了一種叫做ASX-SGX Link的同步交易連接體制，是2001年12月在新加坡交易所和澳洲交易所同步推出，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步交易連接體制。這兩個交易所各自為對方開了一個交易窗口，開始時只有50隻股票，後來增加到100多隻。只要股市開盤，澳洲和新加坡的投資者就可以通過本國的經紀，直接在對方窗口進行部分股票的同步交易，也就是說澳洲的投資者能在澳洲交易所買新加坡交易所的股票，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能在新加坡買澳洲交易所的股票，雙方按當日匯率進行結算。

這個體制應該說在世界上是一個創新。既然兩個不同的國家都能夠這樣交易，而且相距還那麼遠，在地緣上緊密聯繫的香港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我覺得也可以採用這樣的體制，以條件而言港深合作無疑更為有利。如果採用這樣一種跨境的資本合作體制，可能促進香港股票市場向國內延伸，對於吸引國內資金應有重要作用；同時對促進深圳股票市場向境外延伸、吸引國際資金也有重要作用。而且隨著窗口的擴大，將會形成港深兩個證券市場的實質性合作。這當中需要有一個突破口，光談是不行的。而世界上已經有這個先例，港深合作能不能借鑒呢？

當然，推進港深兩個證券市場建立窗口合作體制，遇到的最大阻礙是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還不能自由兌換。如果在深交所開設窗口，交易香港創業版的股票或者香港主版的股票，投資者用人民幣買香港的股票，那麼兩個交易所在每日結算的時候，就遇到了需要國際貨幣進行差額支付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首先是差額支付的量畢竟不是很大，兩個交易所之間你有買我的，我有買你的，相互抵消。由於差額不是很大，我們可以放開一點口子，人民幣可以在資本項目下在這一點進行一個自由兌換試點也是可以的。人民幣遲早是要自由兌換的，可不可以從這裏搞一個試點，在港深兩地資本市場的合作上開始嘗試一下，這個難題我認為是可以解決的。

第二個理由是香港銀行已經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港交所因此可以用人民幣和深交所結算，現在的形勢比兩年前條件更形成熟，因此我覺得港深兩個證券交易所應該借鑒新加坡和澳洲在2001年推出的同步交易連接體制，各自為對方開一個窗口，為對方掛牌交易若干隻股票，來作為兩地證券交易市場合作的實質性突破。在此基礎上擴大，把兩個證券市場聯合起來，把國內和國際資本市場聯繫起來，發揮香港對內地的帶動作用，也促使內地企業走出去，這是有重要意義的。我在這裏拋磚引玉提出這麼一個觀點。

香港與深圳：雙城發展與規劃

(葉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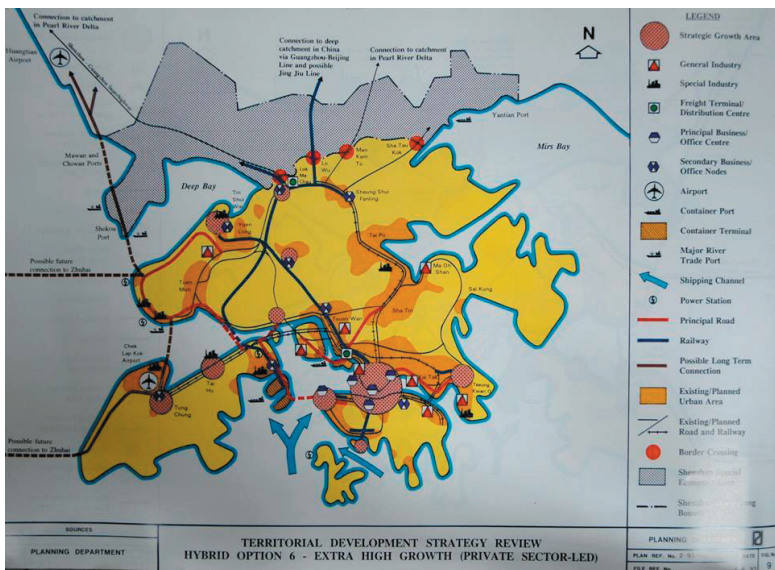
我很高興今天能就這個題目演講，因為對這個題目我已經作了很長時間的研究。香港從1950年開始的發展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奇跡，但是深圳的發展也是一個奇跡。1980年代時的深圳，很多東西都是剛剛開始；1981年深圳的總體規劃，現在看來已經不合時宜了。當然你看到現在的羅湖區有很多高樓大廈，這些都是當時規劃好的。現在深圳規劃發展很快，現在已經經過三、四代了！每半年一次規劃。現在的深圳絕對是一個奇跡。

有關深圳和香港的城市規劃，我在1992年9月9日已經和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的邵善波先生進行討論，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都很關注這個問題。這兩個城市是非常相關的，怎樣去改善呢？但是，當時的討論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基本上沒有得到甚麼結果，或許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港英政府。深圳市很焦急：「我們的西部通道怎麼規劃，我們的福田區要規劃了，我們的地下鐵要建了。」問香港的規劃署，他們好像不太積極。在1996年的《全港發展策略檢討》中，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在圖七中深圳好像不存在的。這就是我們的規劃，沒有考慮深圳。這反映了當時的發展，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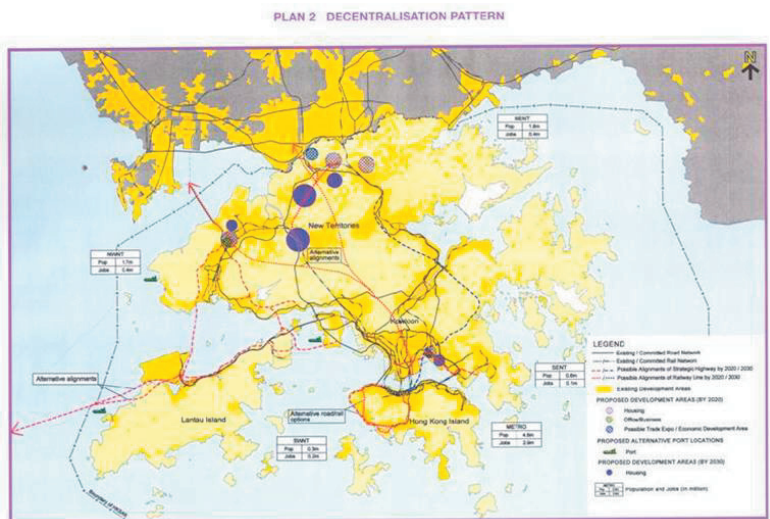
現在已發展到《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已經不是港英政府的工作，完全是我們自己特區政府的工作。兩年前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已經開始推動加強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但是你看圖八，和圖七比較其實也差不多，只是好一點。但是我們不能單看香港的規劃，深圳的市中心在哪裏，圖中深圳各個黃色的部分代表甚麼東西呢？香港的城市規劃當然是和深圳的城市規劃有關係的。跨境通道怎麼走？現在看不出來。圖中只是

16 港深合作發展：尋求前瞻性的思維

圖七：《全港發展策略檢討》，1996



圖八：《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



看到香港重要的地方，深圳重要的地方在哪裏呢？也許你要看深圳重要的地方就買一幅衛星圖好了，不需要規劃圖。深圳所有的建成區我們都可以看到，但是哪些是重要的地方，在圖上是看不出來，也不知道有甚麼關係。那怎樣做好規劃？如何才能加強兩地關係呢？這就需要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看，今天時間有限，所以略過。

我們可以看到將來會有很大變化。珠三角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02年已經超過香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看人均GDP，香港是二萬美元，但升幅有所減慢。然而以深圳和廣州為首的珠三角卻在不斷的上升。珠三角2005年的數字就等同香港的1985年，到2020年就應該和香港一樣了。所以，從楊教授剛才公布的調查結果看到，為甚麼香港人現時主要都是去消費而不是工作呢？主要就是工資問題，如果珠三角工資是高的，不少香港人都跑去珠三角工作了。現在粵港兩地的工資差距很大，但是到了2020年，差距就不存在了。當然不是整個珠三角都會變得很富有，但是會比現在情況好，這個上升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這是將來融合的趨勢。我說向前看，看2020年。當我提出這個結論時，很多商界的朋友都說我太保守了，2015年就差不多了。當然，如果我們把流動人口加起來，也許要到2030年，但是這個良好局面是一定會出現的。

另外，就是香港和深圳及珠三角的關係。過去很簡單，是前店後廠。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是這樣。香港人在內地賺錢，然後拿回香港消費；香港人在當地是有消費，但不多。現在卻不一樣了，楊教授的調查也指出，有70%的人去深圳消費，所以現在兩地的關係很不一樣了。到了2030年、2040年會怎麼樣呢？可能很多的高檔貨物和服務會從深圳或者國內的其他地方進入香港，將來香港的定位會是這樣的。當然這個消費還是會繼續的，這是正常，是動態的，但是香港作為大珠三角生產性服務的基地，從數據上看很清楚的。暫時香港還是有一些優勢，查博士剛才也說了香港是一個金融基地。整個香港有

一百多萬人在服務行業中，然而廣州也有一百多萬，深圳也有服務業；但是如果我們只看生產性服務業，就是比較高級的，香港有差不多一百萬，在廣州有30萬，深圳有15萬，所以香港作為服務的基地還是有一定優勢。這裏主要說明一點，就是香港從GDP、就業、人口、增加值的比較上，都是廣州的十倍以上，是作為珠三角最大的服務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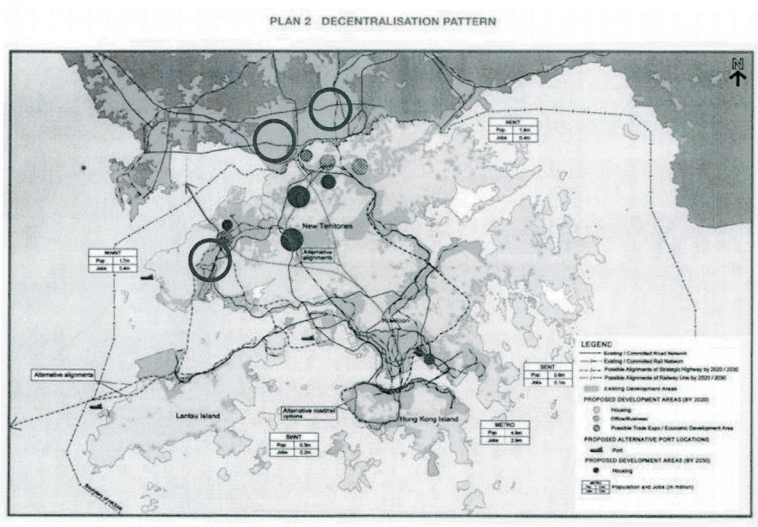
將來港深兩地要更加緊密合作，就要共建一個有活力、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區，其中包括工業、服務業和旅遊業，並向世界進軍。最近這幾年，各城市都著重地方推銷術和旅遊推銷術的運用，這是很重要的，將來各城市的競爭都是靠這些方面。比如上海近年來成功推銷了浦東，香港可作參考，例如「幻彩詠香江」就是很好的推銷。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強港深兩地的交通和過境通道，這是共同打向世界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也是港深兩地一直以來忽略的地方。落馬洲、皇崗過去的過關情況很差，很擠擁，現在改善了一點點；但羅湖口岸仍是很擠擁、很不舒服的，外商怎麼會被吸引來？這是一個大問題！縱然現在改善了不少，但若要改善香港和深圳的城市形象以吸引外商，為甚麼兩地的過境通道不可以像商場一樣漂亮？為甚麼香港國際機場和深圳機場可以有漂亮的通道，偏偏羅湖和皇崗的通道不可以呢？人流通道是很重要的。剛才有講者提及金融問題，雖然說兩地商人可作電話會議，但是也離不開人與人的見面。就如今天深圳學者在過境的時候，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他如堵車、或者繁複的手續、人多等，誤點的情況便會出現。所以兩地必須就通關和過境通道，作出完善的規劃合作，例如為前來深圳和香港的外商提供即時的商務簽證，讓外商利用特設通道過關，不必排隊。另外，現時的直通火車並不是為商務乘客服務的，反之，現在消閒性質的旅客阻礙了很多正常的商務活動。如果我們要發展兩地的商務活動中心，就要研究怎麼理順直通車的建設，不是給普通人，而是為商務設計。改善過境口岸的環境，加強商貿專用的櫃檯和通道。另

外，為加強兩地通道和商貿的發展，我們要為旅客提供旅遊和商貿的一站式信息服務。現時，羅湖口岸兩側都是很亂的，一定要改善。此外，全天候的通道十分重要，例如皇崗已有一些蓬蓋，但是對於旅客來說，拿行李時下大雨，行李便濕透了。所以應該考慮全天候的候車和拿行李的設計，但是現在還沒有做到。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兩地的規劃合作，我認為臨時看一個河套區的規劃是沒有大作用的，將來一定要慎重地把兩地的規劃做好，應該做一個《雙城規劃2050》。各位嘉賓都了解到一國兩制的期限是到2047年，所以從一個長遠的角度看，兩地應該有一個概念規劃，當然不是具體去做。兩地規劃師應該共同去做，而不是現在「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的情況，互相不了解對方的工作，不重視溝通，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比如說羅湖的河套區，有點像上海的浦東，浦東為甚麼現在是一塊寶地？因為在民初，孫中山先生要求對浦東有一個規劃，但是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沒有發展起來。現在時機好，經濟開放，就有一片很大的土地給上海發展。河套區的情況也是一樣，到2050年，它對深圳和香港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香港決定在河套區發展工業，對岸深圳福田區發展市中心，這就不太協調了；另外交通怎麼辦？所以，應該要先行制定全面性長遠的概念規劃。

此外，還要制定一個短期的規劃。香港的西部走廊已經形成，將來西邊會建起港珠澳大橋，西部通道明年應該通車；現在西邊已經有皇崗口岸，深圳的市中心在西邊，赤臘角機場、黃田機場、高新科技園，很多活動都在港深兩地的西邊（圖九），將來如何連成一個產業帶呢？所以，我覺得要好好研究怎麼利用一個交通網絡來在西部發展一個次中心。這個交通網絡若可便利道路使用者在20分鐘內到達西部這些地點，如高新科技園區，對於外來及本地的投資者是個吸引之處；對本地交通亦有好處，現在中環是很堵車的，數據反映，在1981年，香

圖九：規劃合作：《雙城規劃2050》



港人從新市鎮到市中心的出行次數大約為9.6%，就是30萬人的工作出行次數；到了1997年，數字是22%，高達100多萬。新市鎮不僅沒有解決我們的交通問題，更惡化了我們的交通問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中心太過集中，所以我們有需要分散。因為現有很多人居住在新市鎮，到市區上班都很不方便，交通費亦很貴。當然現在和15年前很不一樣了，條件已改善很多。但是，我們應該認真的探討2050年的雙城規劃。

「共同市場」格局下的港深發展機遇

(魏達志)

港深合作的問題確實如前面的專家所言「剃頭挑子，一頭熱一頭冷」，但是，香港對深圳的城市發展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以我個人為例，我是在1984年從上海復旦大學調

到深圳來的，當時深圳就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到處都是塵土飛揚。憑甚麼我離開上海到深圳來呢？原因只有一個，它挨著香港。對於深圳這個移民城市，全國的精英人才都願意到這裏，就是這個因素在起作用。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深圳的崛起和人才的成長都跟香港因素有關，我提交給論壇的一篇論文就是探討共同市場格局下的港深發展機遇。共同市場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一個概念，所以共同市場就離不開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兩個概念之間互動的關係。據我理解，經濟全球化是經貿活動在世界領域的擴大，是一個生產力的國際化過程，它的動力和追求的目標是利益最大化，為了獲得最大的利益而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所以要經濟全球化。它的行為方式完全是民間的、自發的、市場性的。例如港深兩地的集裝箱車轟隆隆的駛過，經常造成堵車現象；但是北京的「京城四少」，所謂四個中青年經濟學家，有三個到深圳來都說這堵車情況是深圳經濟繁榮的跡象。

但是，經濟一體化不是這個概念，它是生產關係的國際化。它追求的目標和動力是經濟成本的最小化，比如我們把關稅免除，歐盟甚至將貨幣統一了，那麼貨幣兌換的手續費都省掉了，成本就變得更低。它的行為方式是政府的、官方的、有組織的、制度性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兩者結合起來，一個是利益的最大化，另一個是成本的最小化，非常自然的形成了並行不悖的兩大潮流。港深之間的關係也是在兩大潮流之間展開的。港深合作近20年來，實際上是民間在交往，就是說經濟全球化表現在港深兩地。珠三角地區經濟非常活躍，但是經濟一體化概念就相當糟糕，因為兩地政府幾乎在20多年中沒有甚麼接觸。但是，現時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生產關係的變革，於是要求兩地政府有更頻繁的接觸。深圳這一屆政府，李鴻忠書記和許宗衡市長屬於膽子比較大的領導而且比較有謀略，我覺得他們看問題還是比較準的，所以許市長到香港來考察提出兩條非常響亮的口號：「我們學習香港，我們服務香

港。」我們這些專家、學者就要為這個定位鼓掌了，因為是非常準確的定位。

經濟一體化，在我1994年的著作中概括為六個層次，最低層為單一商品一體化；第二層叫做自由貿易區；第三層叫做關稅同盟。這三個層次雖然內涵不一樣，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海關在這裏嚴格的控制貨物進出，要打稅。中國作為一個傳統計劃經濟的國家，它對金融管制是非常嚴厲的，攜帶多少貨幣進出境，是要受到金融管制的。另外，人員的進出也是要控制，服務貿易的進出基本上就沒有。但是到了共同市場這個層次就產生了一個飛躍，飛躍在哪裏呢？共同市場這個層次是要實現四大流通，即人員、資本、商品和服務貿易的自由流通。當四大流通實現之後，它使產品市場一體化變成了要素市場一體化。我認為港深之間要進行流量經濟，就是要打通所有環節，讓四大流通能夠流起來，這是雙城進步的一個關鍵。第五個層次就進一步深化，就是共同的經濟同盟，歐盟就是經濟一體化的一個地區，連貨幣、財政政策、宏觀調控政策都一致了，它的經濟一體化水平就更好了。

我現在想探討的是，在經濟一體化的共同市場的格局下，港深兩地實現要素流通之後，它會產生甚麼機遇。第一，是總部的集聚機遇。有一次楊汝萬教授到深圳參與會議，因為沒有媒體，學者們沒有了顧慮，都放開的討論，大家就說得很興奮，愈說愈大膽，指出香港政府以前是不注意和深圳的合作。我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香港是珠三角地區的龍頭，龍頭城市不是靠爭來的，它是靠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來決定的。當今世界經濟競爭的基本單位變了，不再是國家了，國家只有在打仗的時候才是基本單位。在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的時候，可能城市群就是一個基本單位。能夠帶領這個城市群進行國際間交往的城市就是中心城市，就是龍頭。這是根據它的功能和作用來定位的，不是學者、官員來爭的。中國184個城市要建國際化城市，而中國目前現成的唯一一個國際化城市就是香港；其他都

是在構建中的國際化城市，所以就不用爭，香港一定是龍頭。如看總部經濟數字：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出台一年來，在香港建立總部的公司增加到1,098家，駐港代表處增加到2,511家，分別較去年增加13.7%和12%，一改過去總部離開香港到上海去的情況。因為總部經濟就是一個資源秉賦的原則，利用一個信息平台，然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間賺取成本和效益之間的差異。最大面積的覆蓋市場、調控經濟、配置資源，在這樣的一個格局下形成一個總部經濟。香港要明白它和珠三角地區的關係是唇齒相依的，如果香港不依托這麼一個內地大市場，在香港設立總部的公司就要搬走，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香港總部經濟集聚得這麼快，對深圳的影響也是很大的。香港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優越的營商中心，還能夠配資內地的市場和資源，深圳可以和香港聯動發展。

另一個機遇是戰略疊加機遇。國家要考慮國家的安全戰略，比如歐亞美三足鼎立的格局可能是中央政府最要考慮的了。歐盟東擴從15個國家到25個國家，它的一體化進程是最快的；2005年1月1日開始，整個美洲一體化加速，北美囊括了整個南美，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古巴除外；而亞洲的一體化是最糟糕的，最薄弱的，所以中國政府拼命去做「10+1」，即中國和東盟十國；或者「10+3」，就是東盟十國加中國、日本和韓國。這些一體化的工作，就是穩固東亞和東南亞的一體化關係，目的就是為了形成世界的一個戰略平衡，從而尋找到一個穩定的、穩固的發展環境。地區戰略可能是要走出去做生意等，就形成了一個CEPA、一個PECO（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和CAFTA（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三大戰略形成一個疊加式；這種疊加優勢一旦形成，就形成了另外一個優勢，就是空間布局優勢，為甚麼呢？三個戰略組合起來就可發現，在佔整個南中國的泛珠三角，和東南亞的東盟，港深正好處於兩個地理空間的一個幾何中央節點。這個節點非常重要，

它是經濟的、物流的和金融的輻射、物流的布局，和各種經濟的交往成為一個樞紐。這個樞紐是一個地理結構上的樞紐，它肯定會帶來很多便利之處，這就形成新的空間布局的機遇，很多數據我就不說了。

第四就是體制改革的機遇。深圳向香港學習，最重要的就是借鑒香港的體制優勢，這一點各位都是有共識的。現在溫總理到深圳指示，深圳要繼續做好全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排頭兵。怎麼理解這句話呢？深圳的網上討論真是一塌糊塗，有的說是政治改革，我想並不是。我想用兩句話概括一下，當年建立經濟特區是為了打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現在我理解溫總理說的窗口和試驗田作用，就是要打破過去相對比較封閉的體制，建立更加開放的國際性體制。而且，任何城市和地區在建立國際化城市方面如果走在其他城市前面，它一定會贏得很多這種先行制度性的效應。所以深圳和香港的銜接，實際上就是在建立一種新的國際性體制的一種探索。

第五是結構調整的機遇。許多人認為香港的轉型並不成功，產業空心化，製造業空心化。我是不同意這一個觀點的，我認為香港的轉型非常成功，從工業化的第二階段水平，迅速進入後工業化階段。服務業、高端服務業佔GDP的90%左右，這樣一個社會，沒有人可以想得到，其他城市羨慕都來不及，怎麼不成功呢？而且，香港是世界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但是香港很遺憾的，不是一個創新中心。

香港不是創新中心帶來很多問題，首先不能和深圳最重要的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進行銜接；第二，不能支撐香港在珠三角的投資企業順利的轉型升級，沒有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支撐，帶來很大阻力。其次，它很難在這個領域，在世界經濟和科技競爭最激烈的領域，引領珠三角提高整個核心競爭力；而且很難整合港深或者香港和珠三角的創新資源。但是，我們知道香港的創新其實是非常值得學習的，比如香港科技大

學的成功發展。所以，深圳市政府沒有任何理由說深圳發展了25年，辦不出一所好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就是一個例子。深圳市政府只要肯投入資本，引進人才，它就能有好大學。所以我說，如果1990年代香港失去了一個創新中心機遇的話，現在還來得及。如果現在還不在這方面努力，過了十年以後，後悔也沒用。我認為，不要讓在珠三角的港資企業變成追逐生產要素的農牧企業，那裏便宜就往那裏鑽，它一定是要有一個轉型升級的過程，所以創新中心對香港非常重要。而且，香港政府提供了八所大學，這是我們深圳人非常羨慕和佩服的地方。但是，八所大學在成果轉化方面、市場化方面、產業化方面，以及和內地製造業結合方面，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這恰恰是香港作為一個非常務實的創新中心的元素。深圳最近提出，一個「產業第一」，一個「自主創新」，受到廣東省委的重視，為甚麼要自主創新？這是整個珠三角所面對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大問題，珠江東岸和西岸的模式不同，但是兩種發展模式都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高端自主知識產權，沒有高端核心技術；都是產業結構低度化，甚至風險性很大，這裏不詳細解釋了。所以香港應該成為創新中心，現在還有一種說法叫做深港創新圈。如果這個創新圈能夠形成，對於鞏固香港國際性中心城市地位，在未來的廿一世紀激烈的科技全球化的競爭格局當中，可能是非常的重要。

港深政府合作的挑戰

（張贊賢）

我的演講很簡單，主要是對於港深之間政府的合作作出一個反思。首先我先談港深合作的背景。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溫總理到深圳的訪問，相信他到深圳的訪問和決定對港深合作模式有非常大的影響。然而這一點，我在國內和香港的

網頁和報紙都找不到。但是，我相信這很重要，因為溫總理提到，中央可能進一步放寬深港協調合作的自由度，增加深圳在深港合作中的自主權等。究竟這是指甚麼東西，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香港特區官員能夠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分析，我相信這對香港和深圳合作有決定性的作用。

請允許我回顧港深合作的一些背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剛才很多學者也提及，就是深圳在1990年代初還是以工業為中心，包括以高新科技為中心等作為發展路向；1990年代中下期已經很用心的去發展服務業。市委書記李鴻忠的一些講話也提到，要把深圳基本上建設成一個以服務業為中心的城市。他也提到，深圳要成為一個國際物流樞紐城市、國際金融貿易和會展中心、國際文化信息交流中心，以及國際旅遊城市。可以想像，深圳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以服務業為主，而且有很多方面和香港有關係。因為這個相似的發展方向，所以深圳未來發展服務業對香港和深圳的經濟關係一定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香港也在進行經濟轉型，希望保持香港在物流、旅遊、金融和高增值服務業的地位。所以在這方面，我相信一定會有許多機遇和挑戰。另外大家都知道，港深兩地人流和物流都增長很快，所以出現很多跨境問題，包括口岸的問題、交通的問題、保安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由政府之間合作解決，這個也是決定港深政府之間需要合作的重要因素。

考慮港深合作，不得不看到珠三角的行政區劃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是一國兩制，另一方面是省政府來協調珠三角內部的規劃和發展。深圳是一個特區，現在如果溫總理給深圳特區更多的自主權、自由度，那深圳和廣東省的關係會怎麼樣呢？珠三角其他城市各自有自己的發展策略，但是在一些區域性的問題上，我發現他們自己內部也沒有協調好，比如環保工作。所以，珠三角內部行政區的區域發展和區域協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港深合作的重要背景。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其實和東莞及惠州也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地理上這兩個城市和香港十

分接近。在珠三角內部沒有一個區域管治的機構，廣東省過去多次希望協調珠三角的發展，但不是特別成功。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對將來港深合作也有很重要的影響。

最後一個背景因素，是2003年之後，粵港政府建立了合作的框架，主要是第六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提到設立12至15個小組，每年進行很多的工作會議，由香港和廣東省的行政首長牽頭，在深圳就是由市長和香港政務司司長來談，這些機構都是新的產物。究竟這些新機制在推動兩地合作包括政府合作的作用如何呢？這是我個人研究的課題，但是我發現很難研究，因為資料很少，當然能夠建立這個機制，本身就是一個進步，是合作的表現。但是這些小組包括深圳和香港在2004年簽署「1+8」的協議，主要是加強交流了解的協議，包括經貿、科技和教育方面。究竟這些協議已否有效落實？粵港政府能否推動相互了解，改善粵港的跨境問題？所以，未來港深政府之間的合作，應該考慮到現在已有的很多政府之間的機制，考慮究竟如何去協調。很多專家認為港深合作，包括港深政府之間合作的關鍵是一國兩制，當然這是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今天要講另一個因素，即雙方政府如何定位。

雙方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會影響兩地合作能否暢順。在深圳和珠三角地區，政府是強勢的領導者，推動經濟發展、產業轉型，以及社會發展，是一隻「有形」的手；但香港是市場主導，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很不一樣。我覺得，這會影響雙方合作。對深圳而言，能不能通過政府來推動金融和服務業的發展，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規管方面政府的作用很重要。比如說物流，我發現在廣州和深圳，政府在推動物流發展的角色很重要。至於其他領域，例如高增值的服務業，政府的角色應該怎麼樣呢？能否像從前在高新科技發展的經驗般成功？我不清楚。但是，我認為兩地政府的不同角色會影響兩地的合作。對香港來說，政府作用比較有限，香港政府不會直接參與產業，迪士尼是一個例外，也是很有爭議的一個意

外。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的產品（public good），諸如社會安定、治安、教育、基本建設、規劃等。

對於港深合作、粵港合作，香港政府就很為難。香港和泛珠三角的合作，香港一方牽頭的是政制事務局，因為香港沒有一個合適的經濟部門。有效的管治不光需要政府負責，而且需要公民社會和社會大眾的支持。香港在衛生、教育和環保方面的工作，明顯表現出政府不能說了算，還需要社會的合作。這個問題在區域發展中，比較少談。我相信在將來會談論很多跨境問題，文化、教育和環保問題，也包括社會治安的問題，都跟社會有關係。能不能在政府之間的合作也讓公民社會參與其中？至於其中一部分，例如信息、傳媒和法律，能不能走向國際的慣例，我認為這是比較好的討論點。讓國際慣例作為雙方合作交流的一個平台，作為推動雙方合作和融合的一個起點。

我個人認為，有很多關於港深政府合作的提法是很有趣的，包括港深同城化。聽說是許宗衡市長在一個講話中提到，但是他在香港沒有用這個詞，我也沒有看到它的文本，所以我不確定它的具體含義是甚麼。此外，有很多學者專家提到港深一體化、港深經濟圈。我個人認為當中有部分研究是做得很嚴格，但是亦有很多提法不夠科學，不明所以。究竟同城化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港深由同一個政府、同一套制度來管治呢？剛才葉教授提出的雙城是不一樣的，不是同城。那麼究竟同城是甚麼意思呢？一體化是甚麼意思？因為我認為有很多具體的社會、法律、行政的事項都會出現。香港可以跟深圳進行更深入的交往，比如說允許更多的深圳居民來香港，這政策沒有問題，但是這不是同城化。同城化有很多包括法律上的事項，比較複雜。有些事項看來簡單但是實際上複雜，比如說對等的問題。例如，不少香港的汽車可開到廣東去，廣東的汽車能不能同樣開到香港？所以，在中短期，雙方還是要務實一點，在行政方面還是要加強協調，減少雙方在交往中的障礙。在口岸、

基建、交通、人流、衛生、公安方面加強合作，而不是提出一個很明確但是意思不是很清楚的目標。

要是雙方社會有需求的話，市民自己會來往。剛才楊教授提到的調查其中一點是非常有趣的，即是香港人願不願意到國內住。但是調查的用詞很特別，是說有香港模式的一個社區。現時，在珠三角地區香港人聚居的地區都是一個小香港，香港人沒有跟當地的社區融合，這是很奇怪亦很有趣的現象，是在社會層面缺乏明確的共識。社會可以交往，然後自然便形成更多共識。我相信今天的論壇，包括調研，都是非常有助的。多了討論，雙方交往多了以後，才知道究竟哪一個模式的城市發展、空間發展最合適。經濟上的競爭是沒有問題，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但是，在珠三角很多區域發展的競爭當中，我發現了不平等的競爭，因為政府在背後推動。各市都建碼頭、建機場等，都是一些案例。所以，我認為在短期，政府可以做的是保持市場可以公平的競爭，政府應退出市場，從而提供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我相信這麼做的話，會有更多外資流到珠三角和深圳。在未來的發展目標上，我沒有明確目標。我覺得政府的作用就是減少障礙，在經濟上增強競爭的平台，而不是參與競爭。

今天的講話我總結如下。如果把目光投向政府之間的合作，我會提出三點，第一，是如何加強雙方的交流和了解。這在2004年的「1+8」協議中已經提到，我認為有很多協議都是為了加強交流和了解，也包括雙方政府共同參與的對外推廣工作。但是，要進一步加強了解和合作，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要面對，包括政府政務信息共同使用的問題，原來這是粵港合作最早的一個議題。我個人理解是沒有成功，因為通過政府的平台，看不到廣東省政務的信息；香港比較簡單，在網上都可以看到。另外，雙方政府內部的架構因為雙方的了解愈來愈多，可能會作出改變以求得相互適應。因為很難想像所有的事情都找香港政府的政制事務局來辦。所以，政府部門之間，也

包括深圳市政府，交流的機構可能會增加。另外最關鍵的一點，是如何理順市場和政府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深圳市政府減少自己在經濟方面的作用，香港政府可能要增加一些。但是，關鍵不是多和少，有些方面的工作一定是要政府來做，例如衛生、公安、口岸、基建、環保，都是應該由政府操作。但是，在一些市場可以做的領域，應該讓市場運行。我相信，這樣，整個珠三角以及港深之間的營商環境一定會更好。最後，現在已經有了很多合作的框架，未來港深之間的合作如何跟原來的框架作出協調，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因為香港和上海、北京明確地在政府之間進行合作，香港也和很多內地的城市有合作框架。怎樣理順會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認為政府間的合作是必要的，在政府一定要做的工作範圍內，政府要加強角色；但是在其他應讓社會、市場來做的方面，要加大他們在改善市場化、跨境問題和區域發展的作用。

港深資本市場合作的政策空間

(王一萱)

在港深市場資本合作的政策空間上，我想講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港深市場資本合作的金融政策沿革；第二，港深市場資本合作的現實需要；第三，分析港深市場資本合作已經具備的條件；最後，影響港深市場資本合作的政策因素和建議。

首先，港深市場資本合作的金融政策沿革，剛才張教授講到了政府在港深合作中角色如何定位。以我在國內金融界十年的經驗，我認為在金融政策中，相對於其他行業，內地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比較強的。因為內地金融政策的制定權力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像深圳這樣試驗田一樣的特區，是沒有政策的制定權的。因此，我們談港深資本市場的合作，首先要遵循的就是中央金融政策開放的沿革，在這方面可以回顧一下其中的重要事件。

港深兩地的合作，第一個事件應該可以追溯到國內企業在香港上市這一試點政策。這是在1991年由國家體改委作了一個關於「中國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研究報告」。報告的總體結論是，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是利大於弊。1992年4月下旬，當時的聯交所主席李業廣帶隊到北京，和朱鎔基總理商量選擇十家左右的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並成立了內地香港證券聯合工作小組，負責研究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一系列法律問題、繳稅問題和交易問題。1993年，國內青島啤酒等十家企業先後在港掛牌，掀起了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一個浪潮。

第二個事件，應該說是B股市場。1991年11月、12月由深圳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各自發布了一個人民幣特種股票的管理辦法，允許國內的企業通過私募的方式向境外投資者出售股票，然後在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分別上市。B股市場的發展可以說是資本市場開放的一個試驗田。

第三個政策沿革，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協議的簽署，進一步開放了內地的市場。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了WTO。關於資本市場的承諾，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允許外國的證券機構直接投資B股，成為兩個證券交易所的特別會員；第二，允許境外證券公司在國內合資成立證券公司，在三年內持股比例不超過33%；第三，外國的公司可以和國內的基金管理公司合股，三年內持股可以達到49%。經過三年，這個政策基本已經達到上限。

第四個政策，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和證監會聯合發布了一個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政策，主動開放了中國的A股市場，允許境外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可以買境內的A股。

最近的一個政策開放，就是CEPA。2004年6月，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簽署的CEPA協議，針對香港市場而更大的開放內地的資本市場，主要有三點承諾。第一，允許境內的保險公司包括民營企業直接赴香港上市；第二，允許港交所在北京成立代表處；第三，允許香港的從業人士在內地申請從業資格。

從資本市場的開放政策沿革來說，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主動開放和規則要求相結合，內地的開放除了遵循WTO和CEPA的一些規定的要求以外，還自己主動地實行了QFII政策；開放的先後也是按循序漸進的方式，最初開放的是企業赴境外上市，市場在外面；以後又有一個合資的安排，可以進入內地的市場。最後又有QFII，使境外投資者也能進入A股市場。總體來說，是由簡單進入深化的過程。第三，就是以香港成為主要的合作方。內地的主要境外上市地是香港，CEPA也是針對香港市場而設計的。以上是我首先想和大家回顧的政策沿革。

第二個方面談港深資本合作的現實需求，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的需求。首先是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需求，在CEPA簽署以後，緊接而來的是粵港的「9+2」；港深也有一個「1+8」的合作框架。這些合作的逐步實行意味著珠三角、粵港，以及港深，進入了一個由政府推動、民間主導、雙方協調的新階段。在這些合作中，應該說港深合作是最緊密、最前沿，以及最核心的一個層次。從香港證券市場向內地拓展業務的需求而言，香港本地上市企業的數量是有限的，將目光投向內地是香港證券市場近年來追求規模擴張的一個選擇。目前內地背景的上市公司，包括紅籌公司和H股公司，已經佔到了香港證券市場市值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從投資者的資金方面來看，內地資金只佔香港現貨市場資金來源的4%。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對等的分配。我認為，港交所在吸引內地公司上市的同時，也可以積極拓展內地的投資者基礎。第三個需求，從深圳這一方來說，深圳證券市場有一個國際化的需求。深圳作為內地資本市場的發源地，擁有全國獨一無二的資源，即深圳證券交易所。但是，由於一些特殊原因，深交所停止發售新股三年，2004年才開始發售中小版企業。在這三年中，深交所的地位是有所下降的。深圳證券市場的二次騰飛需要借助香港這個金融中心資本市場的龐大資源，提高深圳資本市場國際化的程度。在國內

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過程中，實現更大的市場份額。所以我覺得兩地在資本市場中合作的現實需求是很強的。

下一個題目就分析具備的條件，我相信兩地資本市場合作已經具備了一些條件，具體為以下六點。首先是港幣和人民幣的問題。香港已經漸漸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實際上是人民幣存量最大的地區，存款有二億多港幣，流通中也有上千億的人民幣的存量。港幣在深圳也是最大的滯留地，因為有一個龐大的B股市場。所以，兩地開展合作的貨幣優勢還是很明顯的。從境外上市的來看，深圳現在有大量的企業在香港的主板和創業板上市，像比亞迪和平安保險，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企業。從B股市場的份額來看，深圳B股市場的主要經濟商和投資者也是來自香港。QFII市場在開放兩年多以後，以及現時在內地批准了26家機構，40億美元的額度也在不斷的擴大，2005年要擴大到100億，深圳證券市場QFII的進入也是比較快的，在2005年6月底佔到整個市場的1%，而且加速的跡象非常明顯。經濟管理公司方面，國家成立的14家經濟管理公司，有3家落戶深圳，在政府的監管層面，香港證監會、中國證監會，香港聯交所，以及深滬證交所有一個五方會談的機制，定期進行會晤。港深兩個證券交易所的高層，也有一個聯合工作小組一直在進行會晤。所以我認為港深兩地合作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條件。

最後，我想討論影響港深資本市場合作的政策因素。CEPA簽署以後，港深的聯動或者說一體化的程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我有一個總體判斷，我認為港深在貿易項目和服務項目之下的緊密程度是很高的，很頻繁的；但是在資本項目，或者資本市場的開放還是比較落後，甚至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合作還不如銀行系統的合作。在銀行系統，我們看到人民幣可以在香港存款；另外兩地的銀聯，這些安排都是加速的。其中涉及到兩方面的制約，首先就是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人民幣在1994年成為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貨幣，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一半以上

的資本項目還是受嚴格管制的，尤其是在證券交易的項目下。所以說，兩地的資本市場合作要在證券交易項目下進行任何實質性合作，都會受到資本項目開放的制約。任何實質性的合作，例如跨境交易、跨境交收都會有所制約。所以我們估計，資本市場的開放還有五至十年的路程。這是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第二個就是內地資本市場本身的發育程度。內地資本市場制度性的建設暴露了一些問題和風險，證券機構也在進行整頓，市場還沒有完全走出低谷，所以影響了對外的合作能力。

我認為，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合作，必須健全自身的資本市場。在此，我有三點政策建議。第一，國內資本市場應該盡快完成股權分置改革，為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第二，應該利用近年來中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現在外匯儲備高速增長，已經達到7,000多億，應該利用這樣一個局面去推動和鼓勵資本項目下外匯的有序流出；第三，政策制訂者應該大膽嘗試，拋棄傳統觀念，授予深圳市金融綜合創新權利，這就是剛才講到中央的部分金融權應該可以下放到地方，讓地方政府具有談判的權利。比如浦東，就爭取到了綜合創新權，包括金融。這樣，港深兩地資本市場的合作就能夠盡快取得突破。

（楊汝萬）

對兩地來說，證券方面和金融方面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環節。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有發言的朋友都是在經濟、規劃、政治方面表達了他們的高見，而接下來兩位就轉入教育改革方面的討論。

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的互動發展

（鄭振耀）

我希望從比較宏觀的角度，重點探討一些兩地高等教育方

面的發展，並集中於香港政府在過去兩年在教育方面的一些重要環節。2003年8月的第六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成立了教育專責小組，加強粵港兩邊的教育合作。2004年2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連同香港八所大學校長級的代表團訪問了廣東省教育廳，作多方面交談，包括有關兩地如何再進行深入的合作。2004年成立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中，有一個工作小組，就是包括科技、教育和人才資源的工作小組。2004年6月，在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發展論壇中共同簽訂了一個框架協議；同年7月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位證書的備忘錄》。香港的教育局局長李國章，到北京和教育部簽訂特別的協議；同年9月和10月，成立了「香港高校前景與願景」討論小組，由香港中央政策組組織八所大學的副校長、中央政策組的組員、教育統籌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訪問了北京教育部和廣東省，商量在教育方面如何進行更多合作。在四川成都舉行的泛珠三角第二次會議也談到了教育的問題，這裏就簡單的和大家重溫一下過去的里程。

第一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在「9+2」合作框架的第四條提到科教文化合作核心，當中包括加強九省區高校校際的交流暨合作、聯合辦學的探討、學分互認、加強科研項目、建立九省區高校的國家級和省級重點學科和試驗室等等。當然在實際的操作當中還需要再加把勁。2004年9月，中央政策組組織到北京和廣東省進行一個特別的訪問，我和楊教授都是成員，其中有幾個問題作為重點討論，包括從內地教育發展的整體框架來看，香港高等教育究竟有怎樣的特點和優勢呢？在國家的高等教育長遠發展戰略中，香港高校究竟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在中國教育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香港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根據CEPA的精神，是否可以將香港列為介乎境內和境外的教育特區呢？

2004年10月，這個團訪問了廣東省教育廳，對廣東省的整個高等教育的情況和改革作了深入了解。教育廳官員告訴我

們，在廣東省，包括廣州和深圳在內的高等教育的水平有待提高；高等教育的規模還是偏小，尤其是相對長三角地區；高校課題的創新能力也是有待增強；高等教育快速發展所存在的瓶頸制約；以及民辦高校發展是否可以加速。此外，訪問團也了解了從現在到2020年廣東省教育現代化建設的綱要。整體的大綱是這樣的：現時是第一個階段，就是快速增長；第二階段，從2011年開始，利用十年時間以達到全面提高期；第三階段是追趕和超越。過去幾年來，即第一階段中，廣東省普通高校本科生在校生大量擴招，增長超過20%；在校生平均的增長率也非常快，平均每年22%；研究生方面，在過去的兩年間增長了27%。在廣東省內有佔地面積17平方公里的大型大學城建設，今年應該完成入校進程了。在量方面是做了很多。

在訪問過程中，我們也和廣東省的不少校長談過，了解他們怎樣看香港的高等教育，集合來說有這幾個優勢：比較有國際視野；在學校硬件、學科專業、教師隊伍、管理體制模式、質量、網絡、通訊、科技、英語授課等方面有優勢。至於在合作方面呢，還有很多方面可加強，包括某些重點學科建設，教育資源共享，包括教授、人才、學生、研究等。對經濟發展貢獻能否增加持續性、在創新科技方面是否要加強培養呢？政府政策配合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合作？教育廳廳長表示，現時已經有一個良好的基礎，有大量的空間和美好的前景，但是需要各方面大力支持、鼓勵和引導。

另外在合作方面，教育廳表示在政策方面，在粵港、泛珠三角框架發展之內，需要作進一步研究以促進發展。例如學校方面能夠保持定期的校長層會晤；本科生、研究生、學科建設、教師互聘、科研產業化、資源共享等方面，最好能夠有深入的課題研究。大家達成的共識是，這個並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必須做的問題，是做些甚麼、如何做、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現在討論的問題應該是朝這些方向，而不是過去討論應不應該的問題了。

此外，中文大學也成立了珠三角的工作小組，2004年訪問了深圳市政府、教育局、深圳大學和信息學院等，作了一些交談和了解。其中，深圳其實是有比較好的優勢，如在交通、人力資源，地理環境等。剛才的討論基本上談到了這些問題，我們明白深圳市政府在過去的十幾年內，在教育方面的投資是非常大的，包括高新科技產業園區。虛擬深圳大學園的建立，深圳市政府也投入了很多資源，成了一個很美麗的校園，面積和中文大學差不多，130多公頃。市政府也引入了內地的名校進駐深圳大學城，包括北大、清華、哈工大和南開。基本運作差不多達標，只是時間計劃比原來慢了一點。主要困難還是在研究生、研究生院方面的一些合作，市政府雖然出了很多力，但是還不足夠，希望更進一步。我們提到，是否香港的大學應該在整體的規劃中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呢？我們和梁副市長談的時候，他同樣認為有些項目能夠為深圳發展和企業連接等方面作出貢獻，他們是很願意從各個層面大力支持的。教育局長也在一些具體的方面提了意見。深圳市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在我們的理解，在領導方面是作了很多積極的事情。

香港的大學在過去的這段時間中有些甚麼發展呢？可以說，內地及香港30多所著名高校、18所國際院校已在深圳開設研究及教學設備，可說是各自精彩。例如，城市大學有深圳研究院和科研大樓，最近也投資了工業科技中心；理工大學也作了很多相關的事情，如中藥等特別的研究，最近更有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科技大學建立了深圳研究生院和學研基地，當然在南沙科技信息園的投資也是非常龐大的；香港大學和北京大學合作設有教學和研究中心。當然這不是全部的內容，僅是我們知道的一些簡單資料。

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在學術方面的聯繫，包括聯同清華大學研究生院開辦的兩個課程，另外還有很多聯合研究中心，包括醫學院、研究生院、太空科技。另外與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其他研究院和教育學院等，也有不同層面的教學合作項

目。但是，整體來說，還是做得不夠，還有很多發展空間。我們需要的是更有系統、深化和戰略性的合作。剛才大家也提到港深「1+8」的合作協議，教育也是其中重要一環，尤其是科技人才的培養。剛才我聽到深圳新任市長6月來到香港，提出很多方面需要加強和深入合作。其他講者亦提到溫總理本周來到深圳，要促進港深全面加強合作，中央將調整相關政策以提高雙方合作的成效，張教授提出了要分析這個政策的實際意義，這就需要各位的詳細探討了。段樵教授提出的港深雙子城和港深融合的概念也是很值得大家的探討。

最後，我的結語是引用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科技教育和人才資源工作小組的一些結論，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們可以看到，特別是包括教育人才資源培育，是大珠三角要保持的一個長期競爭優勢，必須培養先進創新的人才，提升現有員工的水準，而且要挽留現有的優秀和有經驗的人才。香港在大珠三角有龐大的投資，僱用員工超過千萬以上。在培訓各方面應該積極配合以提升兩地優勢。教育服務提升包括大學、專上、專業職業、短期培訓各方面整體的思考。希望兩地政府對兩地教育在監管、保證素質的情況下，可以促進各個層次的學位學歷。在專業培訓的課程中採取比較寬鬆的政策，同時希望兩地政府可以促進學術人才流通，包括進出境便利，從各方面作出一些實際的配合。剛才葉教授也語重心長地提出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意見，希望加快兩地各方面的專業資格的互認和銜接。在科技方面，提出港深在聯合主辦產品設計的有關國際會議上能夠做得更好，注重中長期的培訓課程。針對整個地區的發展前景，多層面的專業教育人才培養是需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和研究。在其他方面，科研產業化必須加把勁。因為香港本身做得不夠，深圳在這方面是有條件的，兩地發揮互補優勢要做得更好。我在這裏簡單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看法，主要還是一些資料的整理。希望這個論壇能夠給我們更多的空間，繼續深入地探討並且付諸行動。

港深教育事業的發展

(陳豫川)

我想談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香港定位，在這方面我希望能夠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最近20年來，在全世界的經濟發展中有三大發展趨勢，但是被香港錯過了，他們是IT業、通訊領域和網絡的發展，都被香港錯過了，為甚麼？以及在未來50年，香港還會錯過那些趨勢和機會？第二問題，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怎麼做才能增加一些確定性，比如說，大家談香港的經濟發展會不會比現在更好，我說有可能；會不會變差，也不是不可能。我希望提出一些簡單的看法，在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強化它的可預見性和它發展的確定性。

香港幾十年的發展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努力，過去港英的制度安排（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內地改革開放以前提供予香港的大量轉口貿易，以及內地的改革開放，無疑都是有利於香港的發展。最近，CEPA的制度建立，更有利於香港長期發展。但這些對於香港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香港的傳統定位，主要是一個「流」的作用，比如信息流、物流、資金流和客流的作用。在內地的香港企業家大多不被看成完整的企業家，很多被看成商人，甚至很多香港人給自己的定位也是商人。如果我們把一個國家和區域給一個性格化定位的話，整個香港就類似於一個商人，因為它強調一個「流」，強調買賣。所以，它的性格就像商人的性格，而商人發展趨勢在經濟發展中是最不確定的一類，原因是社會發展變動非常劇烈。商人必然是密切的跟隨每一個趨勢的發展，不錯過每一個機會，這樣才有可能不斷的保持增長和發展。但是，如果僅僅把香港定義為一個商人，那麼香港在將來發展的可預見性、鞏固性和穩定性上就會有缺陷。這是一個結論。下面從三個角度來談。

第一，我非常讚同魏教授的觀點，香港應該著重發展一

些具有產業基礎的東西。內地改革開放以後，香港的「三來一補」企業率先進入內地，在珠三角有很大的發展。但是它們在香港都是很小的企業，而且那時內地的工業都是很落後的。但是，在近10至15年內地的工業發展中，香港企業已經不再佔據主要地位了；台灣、韓國、歐美、日本的企業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韓國和台灣，其國家和地區性格便更像一個企業家；是需要建立產業基礎，而產業基礎的核心是研發，就是魏教授所說的創新，科技創新。香港未來的發展，我認為重點就是要加強產業研發。大學和產業界如果不加強產業研發，如果在未來的30至50年內，香港的經濟仍然沒有足夠的產業基礎，仍然建立在商人的基礎之上，那麼它未來的發展還是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韓國和台灣是香港的榜樣。在這個方面需要大量的引進海外人才，需要形成大學和企業更有力的互動局面，需要在香港以及深圳之間建立更多的研發中心。對於國際的大企業，包括台灣的一些大企業，鼓勵它們在香港建立研發中心。這是很重要的步驟。

第二，我們從深處來看，美國在全世界扮演兩個角色，一個是企業家，一個是金融家。因為金融家所佔的產業平台比企業家更高。從金融家的角色來看，香港一直定位在亞太區的金融中心或者國際金融中心。但是這個金融中心定位在發展路徑選擇和模式選擇方面，我認為還是有值得探討和發展的地方。比如說，如何使香港真正成為整個亞太區的證券中心？前十多年，因為內地政府的制度安排，導致內地的一些優秀企業，無論是紅籌也好還是國企股也好，來到香港上市。這一方面在國有企業國際化方面發揮了作用，另一方面對香港證券市場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對於香港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香港需要面對整個亞太區，吸引亞太區的每個國家的優秀企業到香港上市，因為只有這樣，香港才是亞太區和國際的金融中心。使區內的資本、企業家、人流、物流都向香港集中。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平台，引進很多其他國家的優秀產

品。把韓國的、美國的、歐洲的指數，吸引到香港來作為一個交易平台；同時把這些交易平台，包括香港在內，打造成一個亞太區的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中心。比如說，我們能不能研發和交易中國經濟指數，甚至說新加坡經濟指數，所有亞太國家，能不能把他們的經濟指數和產品拿到香港來交易？同時把香港的金融市場、證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跨過各個國家的金融門檻和金融壁壘，滲透到各個國家去，讓這些國家的人可以交易香港的品種。但是首先就是要打開內地市場。當然不僅是內地，而是要面對全亞太區。這樣做，香港才有可能成為整個亞太區真正的金融中心。總體而言，這是有賴於香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設計，以及香港如何向亞太區的國家開放和拓展自己的金融和證券市場，這就是第二個層面。第三個層面，我認為香港的長期發展有賴於教育，當然包括高等的教育，如剛才鄭副校長所講的；但更多的包括基礎教育，就是中小學教育和幼兒教育。香港的基礎教育和幼兒教育和內地相比有先進的地方，但是和全世界相比也有很多不足之處。從提高整個區域的人口素質，奠定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的20至50年的經濟前景來看，香港應該以芬蘭為榜樣，建立強大的教育基礎，才能奠定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關於香港的定位。通過這三個層面，我就是想回答這個問題，如果說前二十年香港錯過了全世界IT的發展、通訊的發展和網絡的發展，在未來50年還會錯過哪些？通過這三個層次的分析，是否可能增強香港在未來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可預見性和穩固性？這是關於第一個主題的總結，主要意思是，香港既是中國的香港，但是無論對香港本身的發展，還是對內地來說，香港更為重大的作用，是作為亞太區的香港乃至國際的香港，所以香港應該對整個亞太區敞開大門。同時，能夠更多地借助於亞太區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把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通過一種制度模式和市場設計，引入香港的金融和證券市場，構成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是關於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港深合作，我公司本身是一個總部設在深圳的基礎教育、中小學教育集團。我們通過八年發展，從只有36個學生的一間學校，發展到四間學校共一萬個學生。現在在廣東省的私立中小學教育中，我們是首屈一指，在全國也排前三名。我著重想談以下幾點，第一，內地的教育市場是非常龐大的。在香港人的心目中，認為教育是一個公共產品和服務，是由政府來投資的。但事實上，在未來的內地，教育會和很多西方國家一樣，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因此，香港的資本在內地的教育市場會有很大的作為，這是第一點。第二，深圳是香港教育界和資本拓展內地教育市場的橋頭堡，因為深圳最具有市場意識。第三，香港在基礎教育方面應該保持一種更為開放的態度，包括對內地優秀的教育機構提供更多的便利，允許在香港辦學。不僅是對內地的，我覺得應該是對全世界最優秀的教育機構，都應給予更多優惠，讓它們在香港辦基礎教育，促進香港基礎教育的國際化和水平的進一步提升。第四，港深教育合作不應該只局限在一些項目和事件上的合作，而應該在CEPA等制度安排下，拓寬准入，大大拓展渠道。第五，深入合作的前提應該是更多地加強雙方教育界的交流與研討。

產業結構和研發問題

（陳振光）

我想請教魏教授和陳先生有關產業結構和高技術發展的情況。在高技術裏面我們可以簡單分為核心技術和一般的生產技術。從核心技術和跨國公司的發展戰略來說，剛才提到了台灣和韓國的經驗，主要是高技術發展的戰略。如果放在香港以及珠三角的發展戰略裏面，馬上就會把香港放入與華南地區，尤其是以上海為主的那種地區之間的競爭。所以，第一個問題，台灣以及韓國的經驗是否對香港有參照的價值？第二，在研發

和研究機構內部配置中，以基礎教育以及整個科研方面的優勢而言，香港和國內還是有一些距離。不要說和北京、上海，就是以華南地區來說，還是有一定差距。在這兩個背景下，我們能夠怎樣推進跨國企業對珠三角地區以及香港地區投放核心技術的研發？怎樣能夠在國家和地方發展的協調中，打開新的格局？

創新網絡

（沈建法）

我回應魏博士剛才所講，關於香港能夠成為一個創新中心的問題。我在這方面並沒有進行很多研究，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如果我們談创新中心，我更認為創新可能是一個網絡，它不是只在一個城市裏面，不是依靠一個城市來解決一個國家需要的研發。比如看英國、美國、日本，它們的創新都不是由一個城市承擔的，它們可能是在全國各地根據產業的配置和大學研究機構的分布，不同的地方都參與到這個創新的過程，形成一個創新的體系。深圳和香港都會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還有上海、北京。我認為可能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怎麼建立一個有利的創新網絡，推動發展，這樣可能會更加明確。而非只是把創新在香港搞起來，內地的其他城市就能利用香港這個發明帶動經濟發展。我們是否應該從一個網絡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呢？

創新體系、自由創新

（魏達志）

內地曾經提出過一個口號，就是以市場換技術。但實踐證明，我們改革開放20多年，我們的市場並沒有換到別人的核心技術。所以我說，整個長三角以及珠三角都是一個低度加工的

工廠，世界工廠。所以人家說，研發中心在美國，印度是個辦公室，而中國是個加工工廠。現在我們談創新的問題，從全國的布局來說，有人做過這樣的評價，北京是一個基礎研究的中心；相對的，上海是一個中間試驗的基地，深圳是一個市場轉化的基地。這一說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幾大支持高新技術發展的城市特點。我認為在這樣一個格局當中，香港應該加速發展所謂的「實驗室」經濟，因為無論城市性格、功能表述，尤其是作為一個城市群領頭羊的香港，從參與國際科技經濟競爭的整體作用來看，香港都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功能。與其說香港過去錯失了很多機會，不如說香港應該從現在開始抓住現在的機會。我絕對贊成剛才幾位的觀點，目前的問題在於如何自主創新。深圳談自主創新，也要依托一個區域創新體系或者城市創新體系，現在這種創新體系理論已經演繹得非常細緻了，包括產業集群的創新體系。從國家創新體系演繹過來，它包括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為主體，這叫做知識創新體系，此外有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以中介機構為主體的技術擴展體系。還有一個是以政府的宏觀政策為主體的政策導向體系，金融支撐和風險投資保障的保障體系，還有提供各種技術交易和市場服務的綜合服務體系，培養高精尖創新人才的培育體系。就是這麼多體系一起形成一個母體系，才算形成了一個創新的架構。

我一個在一個深圳的論壇上提出過一個觀點，就是自主創新絕對不是關起門來創新，我們是要運用開放改革的視野。除了自主創新之外，還有一條非常好的道路就是合作創新，因為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不可能包攬所有的技術，它一定有薄弱的環節，這恰恰是發展中國家能夠突破的地方，從而達至合作創新。例如，深圳有一家企業投資於俄羅斯，這個國家科技發達但是市場化水平很低。這個企業在俄羅斯購買了一個能夠融化火山岩的技術，把火山岩加熱到4,000攝氏度高溫，岩石便融化。再用高科技抽絲，編織成各種各樣的東西，那樣東西就

成為新材料，可以抗高溫，可以作為航空器的外殼，還有汽車排氣管的內圈，用途非常廣泛。因此，這個私人企業就以年均1,000萬的速度遞增發展。而且，它開始要求和俄羅斯科學家進行股份制合作，但對方說不要，只要給他們現金就好了，這企業就悉數給他們美金。其實股份制的利益更加長期，可以永遠分享。結果這企業就一次過用美金買斷了這個技術。所以，這就是說我們的腦筋往這裏想，資金往這裏投，政府往這裏用力導向，科學家向這裏齊心協力，加大投入，加大實驗室經濟的建設。我相信香港的作用一定比現在更好。

香港三錯機會？

（楊汝萬）

我希望請陳先生補充並解釋一下香港錯過三大發展趨勢的問題，一個是IT，一個是網絡，一個是通訊。我對這些項目並不熟悉，但作為一個香港的居民，看到香港在過去的十多年在這三方面的發展都十分良好。有的可以說是超前的，比如說發展3G，香港的和黃在這方面應該說是全球最大的營運商，在歐洲很多地方都是排第一的。只是到目前還是虧本，但是兩年之後可以賺錢。我去北美洲，完全看不到3G，香港比北美洲走的要快，因此，怎可以說香港沒有掌握到在IT方面的機遇？另外就是手機的滲透率，我想在全球範圍香港也是排列前茅的。我認為香港人是比較難以接受香港錯過了這三個機遇的說法。

產業集群發展

（陳豫川）

回答楊教授的問題，我指的更多是從產業的發展角度而言，因為和黃的例子是一個個案，它不代表整個香港在整個產

業基礎的發展背景。但是台灣、韓國、美國等地，它們的發展都是一個產業集群，一個趨勢，一個時代裏面它領先了；並且是幾十家、幾百家企業在佔領市場，這是一個方面。像手機，這是在消費層面，我基本的理解還是從產業的發展角度，而這幾個大的產業發展，在前20年畢竟是全球經濟最關注的，引領了全球的經濟發展。那一個國家或地區佔領了這幾大產業的高端，那一個國家或地區就等於在走向前頭，佔領了高端利潤，成為了排頭兵，其他的國家和地區就要跟著它再走了。

高新科技，港深合作的必要

（葉嘉安）

我跟進這一個問題，我認為陳先生所說的問題應該不是網絡IT技術，而應該是高新科技，好像韓國發展的高新科技已經把日本打垮了，Sony已感受到威脅。這很簡單，陳先生問了一個問題，為甚麼香港沒有發展起來，香港錯過了機會，為甚麼呢？原因很簡單，韓國、日本和台灣，它們把GDP的5%投放在研發，香港只是0.2%至0.5%，怎麼跟它們競爭。再加上香港的GDP總額偏小，這樣就是小中之小了，這是最大問題。將來香港會錯過甚麼，我很難說，但是香港發展高新科技是前途有限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工資高，所以，最重要的還是香港的生產性服務如何替全中國服務。眾所周知，中國的市場很大，我認為，值得我們做的，包括在座很多經濟學家在內，是生產性服務行業的研究。我們真的要加快港深合作。剛才提出要吸引別人到香港來投資，其實香港已經是完全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別人來不來是另外一回事了。這並不是香港不鼓勵別人來投資，香港在這方面是很努力的，但是別人來不來不是操縱在香港的手上。

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港深合作。在金融上，是單向的，就

像人流一樣，總是香港人到內地去，內地的朋友來香港很麻煩，現在可能好些，因為有「自由行」了。香港的貨幣在深圳流通是沒有問題，帶多少港幣到深圳都可以；但是你有大量人民幣，就是沒有辦法運到香港，所以我認為如果兩地要加快融合，便需要有一個長遠的《雙城規劃2050》。但別要等到2050年了，不然香港就死掉了。最重要就是港深金融管理局。現在有很多人，在深圳或者國內賺到錢，但沒法把人民幣帶到香港來；要通過不正當的途徑，如第三者或者地下錢莊。若然要加深兩地的合作，便要發揮深圳的功能，響應溫總理的指示，和深圳加強合作，成立港深金融管理局，通過這個管理局，把兩地資金的流通納入一個正常的途徑，讓在香港的民企可以把錢帶回內地，現在太多不合法的途徑，是嚴重妨礙兩地經濟合作的。如果把這個管理局做好，香港便可以更好的發揮金融中心的地位。好像倫敦一樣，貨幣流通沒有問題。但是現在我們有大問題，港幣進內地沒有問題，但是內地的錢到香港就問題很大。

教育合作空間

(鄭振耀)

我想回應一下教育的問題。2004年10月，我們去教育部的時候，聽了很多國家整體戰略，未來25年非常大的戰略和新的整體布局。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整個計劃當中，有沒有任何一段提到香港呢？研究所的所長說，沒有。對我們來說，特區政府在整體的教育戰略中是空白的，不像內地有一個整體的發展設計。問題在於一國兩制之下，大家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磨合。究竟兩地的關係應該是怎麼樣？我們錯過了很多機會，剛才講者提出這一點，我也有很多這樣的感受，但是這有歷史等方面的原因。現在如何重新定位是很重要。就是我剛才提

出的幾個問題，可不可以在整體的研究中，讓香港的專家和學者參與這個整體的發展藍圖，把香港放進去。香港本身的規劃也應該把國家的發展放進去，這才有可能作出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合作。應該說，大學是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大部分屬於點點滴滴，不是在一個整體政策上。剛才說到關於辦學、科研的項目，香港的學校參加了不少「863」、「973」等項目，但是所有的錢就是不能放在香港。我們可以在內地和人合作，但一分錢也不能拿到香港來，這就是很大的障礙。況且，香港本身可以研究的項目是很有限的，大型的研究項目是屬於國家級的、地區性的。這方面香港就面對比較大的局限。在這個方面我們跟教育部和科技部談過，他們說這個問題真的要探討。現在從政策上來說，是很難讓香港去建一個國家的實驗中心、重點實驗中心。香港學校有很多實驗中心，但在實體中和財政上都不是真正意義的重點試驗中心，香港接不到大的項目，這裏有很多人才用不上，而國內又有很多需要，希望香港的專家參與。像研究生，香港這裏是很缺乏的；到中山大學，他們說該校有一萬個博士生在等候，他們的導師每年要帶40個學生；但是在香港，很少有一個教授可以帶超過五、六個以上學生的。這個怎麼結合，中間的障礙是存在的。剛才張教授和魏教授都提到了這些問題。還是需要從政府層面，把已談了很多的、不清晰的東西化作具體行動，大家一起努力。

港深金融合作

(王一萱)

葉教授和鄭副校長都講到金融不方便的問題，我認為，在金融發展上，國內的金融管制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的，所以可能會制約兩地產業的融合和教育的交流。雖然在經常項目下貨幣可以兌換了，但是每次帶出來，從原來的6,000人民幣，到現

在1萬、2萬人民幣，還是有一個額度的限制。QFII的實施拓展了境外投資者在資本項目下的投資，但因為種種原因，國內資本市場的承受能力不可能在近期實現顯著的提升。所以，我認為產業的合作需要給深圳一個試驗的機會，深圳有一個更好的配套的政策，兩地的融合便會更快。

中央政府角色

（張贊賢）

很簡單的總結一句，其實很多範疇，比如教育，香港的經驗和深圳差不多，中央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不能光是談港深合作，而不談粵港和中央在協調方面的角色。

結語

（楊汝萬）

今天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主辦的「港深合作發展前瞻論壇」到此就圓滿結束了。我利用這個機會向在座所有的演講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謝。你們的參與，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我們希望這是港深合作的開始，因為這個題目非常重要，開一次會是談不完的。我希望將來有其他的機會可以交換意見，也對兩個地方的政府和學者發揮更大的作用。

附錄一：參加者名單

- 召集人：楊汝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
- 講者：王一萱（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副所長）
- 查振祥（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 張贊賢（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 陳豫川（卓識公司董事長）
- 葉嘉安（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環境管理中心講座教授）
- 鄭振耀（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 魏達志（深圳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 嘉賓：于珺（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
- 伍華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 伍謝淑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 吳鈞（深圳證券交易所）
- 沈建法（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 里維寧（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
- 卓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 卓靜萍（香港政策研究所）
- 孫文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 高宏（深圳城市經濟研究所）

- 張力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 梁焯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 郭瑛琪 (香港中文大學學術交流處)
- 陳振光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環境管理中心)
- 馮月秋 (綜合開發研究院 (中國・深圳))
- 黃葉芳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 鄒經宇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
- 雷震寰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 劉展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事務局)
- 劉耀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 潘國城 (香港政策研究所)
- 潘穎君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
- 蕭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 鍾文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附錄二：香港市民對香港和深圳兩地發展前景 意見調查結果

抽樣方法及調查概況

調查日期： 2005年8月15日至19日（晚上六時至十時）
調查對象： 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港居民
調查方法： 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成功樣本數目： 1,005
抽樣誤差： $\pm 3.09\%$

調查結果

問題1：請問你有幾經常到深圳呢？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106	10.5
很少	475	47.3
間中	316	31.4
經常	108	10.7
總計	1005	100.0

問題2：你到深圳的主要目的是甚麼？（可選多項，只問曾到深圳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工作	104	11.6
探親	166	18.5
購物和娛樂	509	56.6
度假	125	13.9
其他	60	6.6
不知道/很難說	13	1.4
總計	977	108.7

有效樣本：899

問題3：你最留意深圳哪方面的事務呢？（可選多項）

	頻數	百分比
經濟發展	142	14.1
與香港的關係	86	8.6
交通問題	133	13.2
治安問題	554	55.1
與旅遊有關事務/娛樂	199	19.8
其他	9	0.9
全部沒有留意	130	12.9
不知道/很難說	11	1.1
總計	1264	125.8

有效樣本：1005

問題4：你本身有沒有需要到深圳工作呢？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904	90.0
有	101	10.0
總計	1005	100.0

問題5：你的家人有沒有需要到深圳工作呢？（只問沒有需要到深圳工作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797	88.2
有	107	11.8
總計	904	100.0

問題6：如有需要，你願意到深圳工作嗎？（只問沒有需要到深圳工作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不願意	461	51.0
願意	360	39.8
不知道/很難說	83	9.2
總計	904	100.0

問題7：你或者你家人有沒有在深圳擁有住宅物業呢？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903	89.9
有	102	10.1
總計	1005	100.0

問題8：你或者你家人有沒有考慮在深圳換樓或賣樓呢？（只問在深圳擁有住宅物業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79	77.5
有	19	18.6
不知道	4	3.9
總計	102	100.0

問題9：你或者你家人有沒有考慮在深圳置業呢？（只問在深圳沒有住宅物業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832	92.1
有	54	6.0
不知道	17	1.9
總計	903	100.0

問題10：那麼你或者你家人計劃何時置業呢？（只問有考慮在深圳置業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半年內	1	1.9
6-12個月	2	3.7
1年或以後	30	55.6
不知道/很難說	21	38.9
總計	54	100.0

問題11：你有沒有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呢？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952	94.7
有	53	5.3
總計	1005	100.0

問題12：你考慮到深圳長住的原因是甚麼？（可選多項，只問有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消費物價較香港便宜	37	69.8
工作關係/方便在內地工作	6	11.3
家人在深圳/與家人團聚	3	5.7
接近香港/可隨時往返香港	15	28.3
居住環境較佳	14	26.4
城市發展規劃好	2	3.8
在深圳有物業	4	7.5
方便退休居住	3	5.7
總計	84	158.5

有效樣本：53

問題13：你不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的原因是甚麼？（可選多項，只問沒有考慮到深圳長期生活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當地治安差	442	46.4
醫療保障/當地衛生情況差	250	26.3
生果金問題	32	3.4
家人意願/家人不支持	111	11.7
滿意香港的生活/已習慣香港生活	532	55.9
覺得沒有需要到深圳居住	7	0.7
沒有錢/沒有能力	5	0.5
交通不完善	13	1.4
其他	50	5.1
不知道/無所謂	19	2.0
總計	1461	153.5

有效樣本：952

問題14：如果老人家長住深圳仍然可以領取生果金，你自己會不會或者鼓勵家中老人到深圳生活呢？

	頻數	百分比
不會	679	67.6
會	261	26.0
不知道/很難說	65	6.5
總計	1005	100.0

問題15：如果在深圳建立香港生活模式的社區，又有香港醫生和醫療系統，那會否吸引你到深圳居住？

	頻數	百分比
不會	539	53.6
會	400	39.8
不知道/很難說	66	6.6
總計	1005	100.0

問題16：你覺得如果在深圳建立香港生活模式的社區，會不會令深圳人反感呢？

	頻數	百分比
不會	596	59.3
會	208	20.7
不知道/很難說	201	20.0
總計	1005	100.0

問題17：你本身或你認識的親友中有沒有到深圳升學呢？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885	88.1
有	116	11.5
不知道/很難說	4	0.4
總計	1005	100.0

問題18：連接香港西面和深圳的港深西部通道快將落成啟用，你會不會因為有新關口而增加到深圳的次數呢？

	頻數	百分比
不會	768	76.4
會	195	19.4
不知道/很難說	42	4.2
總計	1005	100.0

問題19：你知道落馬洲和皇崗自從2003年1月開始有「24小時通關」服務嗎？

	頻數	百分比
不知道	73	7.3
知道	932	92.7
總計	1005	100.0

問題20：你有沒有使用過落馬洲和皇崗的「24小時通關」服務？
（只問知道有此服務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655	70.4
有	276	29.6
拒絕回答	1	缺值
總計	932	100.0

有效樣本：931

問題21：你有沒有因為落馬洲和皇崗的「24小時通關」服務而增加在深圳停留的時間呢？（只問有使用過此服務的受訪者）

	頻數	百分比
沒有	176	63.8
有	98	35.5
不知道/很難說	2	0.7
總計	276	100.0

問題22：你認為在邊境河套區開發跨境工業園和物流集散地會否為香港帶來益處？

	頻數	百分比
不會	228	22.7
會	573	57.1
不知道/很難說	202	20.1
拒絕回答	2	缺值
總計	1005	100.0

有效樣本：1003

問題23：你認為未來港深兩地應加強以下哪方面的合作呢？
(可選多項)

	頻數	百分比
經濟合作/融合	407	40.6
交通基建	296	29.5
人流/物流/資金流	304	30.3
治安問題	548	54.6
文化交流	258	25.7
其他	10	1.0
沒有需要加強	7	0.7
不知道/很難說	55	5.5
總計	1885	187.9

有效樣本：1003

問題24：港深進一步合作發展或融合對香港有否影響？
如有，是正面或負面？

	頻數	百分比
負面影響	168	16.8
沒有影響	140	14.0
正面影響	531	53.0
不知道/很難說	162	16.2
拒絕回答	4	缺值
總計	1005	100.0

有效樣本：1001

問題25：港深進一步合作發展或融合對你有否影響？
如有，是正面或負面？

	頻數	百分比
負面影響	72	7.2
沒有影響	661	66.1
正面影響	198	19.8
不知道/很難說	69	6.9
拒絕回答	5	缺值
總計	1005	100.0

有效樣本：1000

問題26：你認為港深未來的發展方向應朝哪方面發展呢？

	頻數	百分比
更緊密的合作發展	684	68.5
維持現狀	129	12.9
各自發展互不相干	116	11.6
不知道/很難說	69	6.9
拒絕回答	7	缺值
總計	1005	100.0

有效樣本：998

港深合作發展

尋求前瞻性的思維

摘要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聯合籌辦首次「港深合作發展前瞻論壇」，目的是在港深兩地關係愈見緊密、雙方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下，設立平台，讓兩地學者、專家和決策者，在不同主題上進行理性討論，加深雙方在未來共同發展的路向和政策上的了解。作為論壇的準備和討論依據，香港亞太研究所在論壇舉行前一個月，進行一項電話訪問調查，以了解香港市民對港深關係和未來合作發展前景的意見。

兩地共七位主題講者首先在論壇上作出報告，就兩地的經濟、金融、城市規劃、行政和教育各方面發展進行回顧、分析和展望。多位講者不約而同地指出了過往港深兩地缺乏緊密的接觸，合作方式亦相對單向、低層次和被動。但經過近年雙方加深接觸，一方面深圳乃至全國在多方面逐步改革和開放；另一方面香港從政府到市民層面亦加強與深圳的合作和關係，港深形成了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合作。然而，雙方在制度上、政策上和觀念上，仍有必須改善之處。我們相信，港深兩地的合作發展必須繼續邁步向前，在合作方式、合作範疇和合作態度上作出突破，港深合作發展的前景將會更美好。

Hong Kong-Shenzhe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e Search for Forward-looking Ideas

Yeung Yue-man

Abstract

The Hong Kong-Shenzhe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Forum is the first such meeting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enz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s growing closer and the frequency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Forum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s,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makers to rationally engage in dialogue on various subjects and strengthen the basi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on their ideas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Forum and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discussion, in August 2005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arried out a telephone survey to gauge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public reac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nd prospects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Forum was led by seven speakers, who gave their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finance,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The speakers commonly pointed out that direct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places had been rare in the past, and also noted that encounter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had tended to be characterized by one-way, low-level, and passive coopera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closer contact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s a result of reforms and opening up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mainland China, including in Shenzhen. Moreover, they noted the recent willingness in Hong Kong to improve the Hong Kong-Shenzhen relationship at every level. The scale and scope of cooperation is constantly being enlarged. Nevertheles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n the very notion of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must continue and improve, i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re to strive for a better tomorrow.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Research Professor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